



# 近代中國的居士佛教

丁 鋼

自古以來，從事佛教事業的人就由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兩部

份成員構成。然而，古時雖已有不少居士，但發展佛教的主要力量仍在僧人。到了清代，自乾隆帝採取了把佛教教團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的方針，致使情況有所改變，清末佛教的實權已漸漸脫離教團開始轉入在家居士手中。隨之而來的是居士佛教的勃興，其改變了宋明以來佛教日益式微的狀況。他們通過深入研究佛學、興辦佛教教育以及大力開展各種類型的佛教文化事業等一系列的不懈努力，使佛教有了重大的進展，並且成爲近代佛教復興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此，筆者擇其要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畧述史實，以闡明近代居士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 一 佛教理論的研究

中國佛教史上，佛教理論研究的鼎盛時期是隋唐，當時的佛教學者深入探求印度佛學，在中國化的改造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佛教諸多宗派的理論。但自宋明以後，佛教漸趨衰落，祇有禪宗與淨土宗繼續流行。此二宗重實踐輕義理，加以連年戰亂，佛教經典散佚嚴重，各教派僅亦不絕如縷而已，佛學研究無甚進展。

近代佛學得力於居士而振興，一方面承繼了明末以來三教兼治、教宗並融的趨勢，發展爲融通諸宗、內外文學的基本傾向；另一方面也逐漸形成了以法相唯識爲重，統攝其它各宗的時代特色

。從前者看，如被稱爲「中興之祖」的楊文會（仁山居士），就是一位「教宗賢首，行在彌陀」的佛教學者。他不僅華嚴、淨土兼而研習，同時還積極提倡深入研究各宗各派學說。他的弟子，專攻一宗一派的有之，而融會諸宗成大家者也不乏其人，在楊文會的倡導下，兼治諸宗，內外之學成爲當時佛學研究的時代風尚。這又導致了對於佛教理論和歷史進行總體考察的興趣，一批重要的佛教研究著作相繼問世。如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佛學綱要」、「大乘廣五蘊論註」等，黃懺華著的「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綱」、「佛教各宗大意」等，都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傳世名作，這對佛教研究的深入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從佛學理論上講，近代中國佛學以唯識學的復興爲最發達。近代對法相唯識學的研究與發展，可說是自唐玄奘、窺基後千餘年來未有的盛況。這既與章太炎所說，其學說的「精深」、「縝密」，適合近代學術重視樸學的趨勢有關，同時也與窺基「唯識論述記」（此書久佚，楊文會從日本友人處訪求而得以刻印問世）等一批唯識學的典籍重見於世有關，從而引起了人們對唯識學的廣泛興趣。

近代推崇與研究其學者很多，光是楊文會門下就有章太炎、歐陽漸、梅光羲、李證剛、蒯若木、釋太虛等一批名家。當時還有「南歐北韓」之說，「南歐」即指歐陽漸及門下劉定權、呂澂等，「北韓」指韓清淨及門下周叔迦、朱沛煌等。歐、韓二人分別創辦南京支那內學院與北京三時學會，專研唯識學，成爲當時唯識學的重要傳播基地。居士佛教學者們還撰寫了一大批論著，如歐陽漸的「法相諸論」、韓清淨的「唯識論述記講義」、呂澂的「論莊嚴經論和唯識古學」、梅光羲的「相宗綱要」等等，都是代表當時唯識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於此同時，因明學也得以復興和發展。

綜觀居士佛學研究，除以上所舉不同於前代的特點外，還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研究方法上創新，致使在理論上不囿舊說，有所發展。以歐陽師生爲例，歐陽漸提倡「結論後之研究」的佛學研究方法，認爲「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結論後之研究，而非結論之結論。」（「今日之佛法研究」，「歐陽竟無內外學·內學雜著」）反對因循守舊。他通過自己的研究，「毅然摒絕」其師楊文會推崇備至的「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爲「僞說」。並從義理、經典依據等方面作了詳實細緻的分析和比較，提出「法相、唯識非一」的理論，獨步於佛學界。而其高足呂澂雖承師說而不囿師說。他十分重視研究方法，曾撰「佛教研究法」一書，其中不照搬歐陽之法，而是強調研究佛教要「實事求是，分析批判」，既要「運用哲學史一般的研究方法，同時注意到佛學本身的特殊範疇和特殊規律等方面。」他從學說淵源上判明唯識古今學之歧異在於，「俱言唯識而所以解之者不同。」（「論莊嚴經論與唯識古學」）故判法性、法相爲一種宗教。師生之說，雖有所差異，但從各自的方法所研究出來的獨到見解，都爲唯識學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次，近代居士大力提倡研習佛學，不僅在於弘揚佛法，而且非常主張爲社會現實服務，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如歐陽漸晚年曾言「亂之興也自無悲始，始之萌也自親愛始。」（「內學序」）提倡以佛教大悲的精神來救亡圖強。其學生和助手呂澂更是主張「佛法不離世間。」在近代居士的影響下，近代如梁啟超、章太炎等思想家，都援用佛學作爲救國自強的思想武器。當時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競相研習佛學，著述立說。在一些著名大學中，也開始講授佛學。如梁啟超之於清華大學，蔣維喬之於東南大學，湯用彤、梁漱冥、熊十力之於北京大學等，佛學思想滲透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客觀上使得佛學成爲中國近代哲學史和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復次，近代居士還創辦了大量的以宣揚佛教思想，研討佛學義理各種報刊。如狄楚卿創辦「佛學叢報」，范古農、餘了翁和太虛在上海創刊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佛學半月刊」、

顧顯微創辦的『淨業月刊』等等。其中學術價值最高的是歐陽漸創辦的『內學』雜誌。這些衆多的佛學報刊，對近代佛教的復興，都會起過不小的作用。

總之，以上這些特點說明，近代居士的佛學研究已具有強烈的近代特徵。

## 二 居士佛教教育的興辦

梁啟超曾說過，「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此論確有道理。然而究其原因，不能不說與近代居士興辦的佛教教育有着密切的關係。

近代居士的佛教教育追溯其源，則與彭紹升有關。彭紹升，號尺木居士。其受友人影響專心佛學，鑒於當時佛學衰微，他曾與友人汪縉一起共同設立建陽書院，弘傳佛學，這可算是近代最早由居士創辦佛教學校，予居士教育有一定影響。

但是論影響和貢獻，還得首推清末的楊文會。楊文會以其學佛的切身體會，深感當時大多僧人缺乏佛學知識，急需辦些佛教學堂來培養佛學人才。他曾撰寫『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一文，建議「由各省擇名勝大刹，開設釋氏學堂」，並「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各爲三年、九年學成不等。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一』中，還把開設僧尼學堂，作爲中國佛教振興之策提出。他爲釋氏學堂編寫了『佛教初學課本』，將佛教基本教義和歷史，以傳統通俗的「三字經」形式，包羅無遺。並作『佛教初學課本注』，以供初學者用。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秋，楊文會正式實現了辦學設想。在金陵刻經處設立學堂，名「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學生二十餘人。他親授『大乘起信論』，延請諦閑法師講天台宗，著名詩

僧蘇曼殊教授梵文和英文，得慶名士李曉暉講授國文。祇洹精舍因經費短缺停辦後，楊文會又和他人一起，成立了佛學研究會。自任會長，每七日講經一次，聽者踴躍，很受歡迎。楊文會通過祇洹精舍和佛學研究會，不僅促進了佛學的復興，而且培養出不少佛學人才，較著名的有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章太炎、孫少侯、歐陽漸、太虛、謝無量、李證剛、梅拈雲、蒯若木等，他們在佛學研究上都有所成就，而且在日後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乃至社會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楊文會興辦的佛教教育對近代佛教教育的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自他之後，以宏揚佛學、陶冶佛學人才爲目的的各類佛學院，猶如雨後春筍般地大批湧現，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其中，由他的學生歐陽漸所辦的支那內學院最爲著名。

支那內學院的辦學原則是講學和刻經並重。該院成立後，設學、事兩科。事科主在編印佛學著述，以便流行，面向社會宣揚佛學，學科則仿照近代學製，設中學、大學（分補習科、預科、特科、本科等）、研究（又分設正班、試學班）、游學。體現教學科研結合的特點，並詳細規定各級學生的修業年限。教學內容上，除了佛學課程外，還充分體現歐陽先生兼治內外之學的辦學主張。課程上以法相唯識學爲主，其餘研究皆歸束於此。並還開設了算術、代數、生物、植物、物理、化學、文學以及中外歷史地理、音樂、圖畫和手工等課程，梵文、藏文、英文和日文課程也在此列。在教學方法上，採用了講演、討論和指導研究的學習制度。以後又改爲指導自習的制度，以「教授以誘進閱藏開啓心思爲鵠的。」一九四三年歐陽先生病逝，由呂澂繼任院長。他在教學上，承繼先師學風，創立了佛學五科，即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的講習體系，主張對佛學作系統的研究。

在兩位大師的倡導努力下，支那內學院培養出了大批佛學人才。先後在內學院學習過的有數百人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姚柏年

、湯用彤、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陳銘樞、王恩洋等，他們在佛學研究上都具相當的造詣，成爲近代佛學研究的棟樑。另如韓清淨在北京三時學會中所培養出來的周叔迦、朱芾煌等人，也都是近代中國的著名佛教學者。

可以說，近代中國佛學的振興，以及能夠取得顯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公於近代居士對佛教教育事業的重視和實施，近代佛學研究的佼佼者大多出自於居士興辦的佛教學校，便是一個有力地見證。

### 三 佛籍的整理和出版

在中國佛教史上，近代居士佛學活動的另一重大貢獻，便是對歷代佛教典籍的整理和出版。

中國的佛教典籍，自宋明以來時有聚散，加上連年戰亂，多遭焚毀。到了近代，明刻本『嘉興藏』也毀於一旦，僅存的北京『龍藏』是梵夾本，閱讀十分不便。在佛教界最早引起重視的，首推楊文會。他認爲這種狀況於佛法弘揚十分不利，因此『發心刻書本藏經』，以廣流傳。一八四六年，他在南京設立了金陵刻經處。自任校勘，立志重刻方冊藏經。當時有江都人鄭學川協作其事，在揚州磚橋也設立了江北刻經處。楊、鄭通力合作，分工刻經。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楊文會隨公使出駐英、法。在倫敦結識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在交往中，得知日本流傳佛書很多，且有不少是國內久佚的隋唐疏本，共計三百餘種。於是開始特別注意收亡佚經典，收集藏經之外的『古德逸書』。或托人購還，或托內弟抄錄寄回。並將搜求的佛書，選編刊印，訂編『大藏輯要目錄』。楊文會等人的刻經事業，推動了近代刻經事業的興盛。此後刻經之風大盛，使佛籍得以流通，對佛教文化事業

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他逝世後，歐陽漸承揚其遺志，在興辦佛教教育同時，致力於刻經事業。他刻定『瑜伽師地論』後五十卷，並作了長序，使法相學得以昌明，予知識界和思想界很大影響。在內學院中，還特立事科，進行佛籍的整理和出版，並在方法上勇闢新路。隋唐以來，佛學研究通常是據漢譯佛典。由於翻譯和傳抄中的失誤和錯訛，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久未能解決。由此，歐陽漸在內學院非常重視漢譯佛典的校勘，在整理舊有資料時，要求『簡別真偽』和『考訂散亂』，並主張『借助藏文』和『廣採時賢論述』。其學生和助手呂澂繼承其傳統並有發展。進而指出要注意譯者的辨偽、時代錯誤的訂正、原來意義的尋究、年代異說的決定等。在二先生的指導組織下，他們充分利用當時已搜集到的梵、藏、巴利文各種經典，集中人才，從事選譯，或出全文，或錄要義，補正缺失，輸益新知，做到『治梵、巴、漢、藏於一爐』。校勘漢譯經論，考訂辨偽，解答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疑難問題。經他們重新標校輯印的『藏要』，共收有佛典五十餘種，三百餘卷。發行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各佛教大學用作課本，一部分被印度國際大學作爲研究資料。

在他們的帶動下，佛教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又有了新的發展。如熊十力的『佛教名相通釋』，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和『一切經音義提要』等，都屬此中的重要成果。

這眾多的佛教典籍的整理刊印和廣爲流通，不僅構成了近代居士佛教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對近代佛教的振興和發展，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促進作用。

以上三方面的歷史事實，都充分證實了近代居士佛教在中國近代佛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充分認識這點，對於我們研究近代佛學歷史是十分重要的。

（完）